

# 印度教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朱明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 中国与印度是两大文明古国,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互为影响。印度教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 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如天文、数学、医学、哲学、宗教等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祖先曾经从佛教和印度教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古代理想文化。

关键词: 印度教; 佛教; 婆罗门天文经; 婆罗门算经; 婆罗门药方

中图分类号: B982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1)04—0057—06

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 山水相依、互为比邻, 两国人民很早就开始了经贸与文化的往来。根据史书记载, 大约在两千年前, 印度教就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虽然印度教在中国的名声没有佛教那么大, 但是它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一、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

大约在公元前后, 印度教伴随着佛教, 就已从印度传入中国。关于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 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般倾向于这两种观点: 一则为西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 “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 口授《浮屠经》”(见《魏略·西戎传》); 二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 中天竺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 “白马驮经”来到洛阳, 翌年在洛阳建白马寺。无论怎么说, 在公元前后, 佛教就已传入我国。

至于印度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确实很难考证。因为印度教比佛教早产生近一千年, 佛教受印度教的影响很深, 在它的思想中糅杂着许多印度教的教义与学说, 一般人很难区分。例如, 初期佛教吸收了奥义书中的许多思想, 如“业报轮回”、“瑜伽修行”等; 到了大乘时期, 佛教不仅吸纳了吠檀多的哲学内容, 而

且实行偶像崇拜, 移入了不少印度教的神灵; 晚期的佛教密宗, 更是大量汲取印度教性力派的思想 and 修行方式。实际上, 印度教的许多思想都包含或融合于佛教之中, 当佛教传到中国后, 印度教的思想也自然进入中国。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遗迹, 佛教和印度教传入中国的途径, 主要有四条: (1) “陆上丝绸之路”——由印度的西北部, 经克什米尔, 越葱岭, 沿着天山南北两路, 到达阳关和玉门关, 这条路线又被我国称之为“西域道”。(2) “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科罗曼德海岸, 经马六甲海峡、马来群岛, 至我国的广州、泉州等海港, 此路线又被称为“南海道”。(3) “滇缅道”——由印度阿萨姆地区进入缅甸, 再由缅甸传入我国云南省和西南地区。(4) “尼藏道”——从印度向北, 经过尼泊尔, 穿越喜马拉雅山, 进入我国的西藏地区。

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 经过了东汉、魏晋、南北朝, 到了隋唐时代, 中印的佛教文化交流已达到鼎盛时期。在这种交流中, 许多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 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为了寻求宗教真理, 他们跋涉戈壁沙漠、穿过丛林峻岭、翻越喜马拉雅山, 历经千难万险。在这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途中, 不知道有多少中印的香客或学者, 未能达到终点而死

收稿日期: 2011-10-10

作者简介: 朱明忠(1943~),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于半途之中,据说这些香客的死亡率高达90%。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有许多著名佛教学者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印度学者中,以摄摩腾(1世纪)、鸠摩罗什(5世纪)、舍那掘多(5世纪)、菩提达摩(6世纪)为代表,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大量的佛教梵文经典翻译成汉语,同时也通过佛经把许多印度教的思想传播到中国。在隋唐时代,大批的印度僧人居住在中国。据说,6世纪,单在洛阳境内就居住着三千以上的印度和尚和一万户的印度家庭。这足以说明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规模之大。

在赴印度取经的中国佛教学者中,最著名的是晋代的法显(5世纪)、唐代的玄奘(7世纪)和义净(7世纪)。他们不仅从印度带回大批佛教经典,而且也向国人大量地介绍了印度教的思想与文化。例如,法显在《佛国记》中,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印度教民俗和种姓歧视现象“举国人民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即贱民)。旃荼罗名为恶人,为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sup>[1][P42]</sup>

另外,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详细阐述了印度教的教育制度和各种科学技艺“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受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途目流别。二曰工巧明,技术机关,阴阳历数。三曰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sup>[2][P36]</sup>他在解释印度教早期经典——四种吠陀本集时说“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禁咒、医方。”<sup>[2]</sup>此外,在我国的许多史书中,如《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新唐书》、《通典》、《文献通考》等,都有不少关于印度教的记载。

印度教传入中国后,在我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历史的遗迹。在云南白族居住的剑川地区,那里有一个著名的石窟群,名为“石钟山石窟”。在石钟山石窟的第8号窟中,人们发现石窟的正座上供奉着石雕的莲花型的女阴,当地称之为“阿盎白”,意思是“姑娘的生殖器”。在女阴的旁边,还矗立着印度教的天王像和佛像。专家分析,在这里曾流行过一种宗教,名为“阿吒力教”。这种“阿吒力教”,实际上是佛教密宗与印度教性力派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因为受印度教的影响,它也盛行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今天,在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的壁画中,也保存着许多印度教的

神像。如,莫高窟西魏第285窟中,就有一幅笑容可掬、神态鲜明的印度教象头神的画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有一个克孜尔镇,此镇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道。在克孜尔镇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尔千佛洞”。在千佛洞的第179窟中,人们可以见到一幅有关印度教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助猕猴的本生壁画。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印度教神灵的石雕或壁画,就是印度教传入我国的历史见证。

印度教的神庙,在我国也出现过。据史书记载:在唐宋两代,有大量印度教商人从南海来我国经商,许多人长期居住在广州港和福建的泉州港(古称刺桐)。为了敬拜神灵和祈求平安,这些印度教徒在广州和泉州建起了印度教神庙。最早的记载见《唐大和尚东征记》。该书曰:“(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爪哇)等船,并载香药珍宝,自在如山。”<sup>[3]</sup>这里说的婆罗门寺,实际上就是印度教神庙。到了宋代,泉州港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来这里的印度教商人也修建了一些神庙。在这些印度教神庙中,供奉着湿婆大神的化身——“林伽”(男性生殖器),并定时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泉州当地人把“林伽”称之为石笋,他们对这种石笋崇拜不理解,而加以反对。据《泉州府志·古迹》记载:大约在北宋大中祥符四年以前,石笋崇拜出现以后,当地百姓认为这是秽物,引起官府重视,府尹曾派人去破坏之。<sup>[3]</sup>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在泉州出土了二百多件印度教的文物,其中有大量石头制成的“林伽”像,以及毗湿努、湿婆、黑天、罗摩、吉祥天女等大神的雕像。此外,还发现了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往事书》中神话故事的浮雕,以及用古泰米尔文写成的有关印度教的碑铭。这说明,宋代以后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十分活跃。

## 二、印度教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印度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在以前,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影响统统都归功于佛教,却很少有人去区分哪些是佛教的影响,哪些是印度教的影响。因为这种区分是相当困难的,你首先得弄清印度教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差别,才能分清哪些影响是来自印度教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专门讨论一下,印度教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

影响。

印度教在我国的影响是多学科、多领域的,主要表现在天文、医学、数学、哲学、宗教、瑜伽、文学、语言学等领域。

### (一) 天文学领域

印度教崇尚祭祀,为了选择天时以利祭祀,它在吠陀经典中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学体系。印度教的天文学知识,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我国。在我国《隋书·经籍志三》中,记录着许多印度教天文学的典籍,如《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羯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等。<sup>[4][P108-109]</sup>这些经典都已经从梵文译成汉语,详细阐述了印度古代的天文与历法知识,对我国天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我国古代的天文学中,有“二十八宿和五星”说,“五星”指岁星、荧惑、镇星、太白和辰星。而在印度的天文学中,有“七曜”说,所谓“七曜”,是在“五星”的基础上加上太阳和月亮。这种“七曜”说,大约在东汉末年传入我国,曾对中国的天文历法产生影响。《后汉书·律历中》有这样的记载:“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甲辰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课效,复作《八元术》,固等作《月食术》,并已相参。固术与《七曜术》同。”<sup>[4][P109]</sup>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天文家,已接受了印度教的“七曜”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唐代,有一个特殊的印度家族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家族就是瞿昙悉达家族,瞿昙悉达是一位印度裔华人,他的祖先在唐初就移居中国,其家族四代人都在朝廷做官,主要司管天文。其父瞿昙罗,任“皇朝太中大夫,司津监”。据《旧唐书·历志》记载:瞿昙罗在麟德2年(公元665年),受朝廷之命,编制了《经纬历》,经唐高宗批准,与当时的《麟德历》参照实行。他在圣历元年(698年),又受武则天之命,以《麟德历》为基础,编制了《光宅历》。瞿昙悉达本人,曾任“皇朝银青光禄大夫,太史监”。他“大约在景云3年(712年)到开元6年(718年)……受皇帝委托,修理浑仪。开元6年,又受命翻译《九执历》……开元6年至16年(728年),他编辑了《开元占经》一书。”<sup>[1][P167-168]</sup>瞿昙悉达之子瞿昙讷,任“司天少监、司天监”,曾著《大唐甲子元辰历》。其孙瞿昙晏,任“司天台冬官正”。瞿昙家族,深懂印度教历法,当时的中国政府命这个家族成员利用印度算法,在不同的时间分别编制了《经纬历》、《光宅历》、《大唐甲子元辰历等》等。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印度教天文学对我

国的影响。在这四代人中,瞿昙悉达是把印度教历法引进中国,贡献最大的一个。他编制的《开元占经》,已经成为唐代一部重要的天文历算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他还把《九执历》翻译成中文,《九执历》是印度天文历法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专家陈久金先生,对此书进行了研究,他评论说:“《九执历》推算交蚀的方法较为科学,确有可取之处。”“唐朝政府翻译此书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印度算法,与汉历参照,预报日月蚀。”<sup>[1][P168]</sup>

### (二) 医学领域

印度教的医学历史悠久,早在《阿达婆吠陀》中就有大量治病方剂的记载,后来形成了许多医药典籍。在《隋书·经籍志》中,记录着许多传入中国的印度教医学典籍,如《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等等。这些典籍传入中国后,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最早的两部医药学著作——《千金翼方》和《千金要方》,是我国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所著。在这两部著作中,就可以看到印度医学的影响。在医学理论上,印度医学主张:人由四大(地水风火)和合而成,四大不调,百病聚生。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也受到这种“四大不调”理论的影响,他在《千金要方》中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sup>[1][P164]</sup>另外,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还引用许多印度的药方,如“服菖蒲方”、“酥蜜煎煮消渴方”、“阿魏雷丸散方”、“苦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和“天真百畏方”等。

在唐代,中国还有另一部著名的医药学著作,名为《外台秘要》。在这部书中,也详细记载了印度医学在基本理论、眼科医术、药物方剂等方面对我国的影响。例如,在眼科方面,印度有一种“熏烟剂涂敷眼眦”的方法传入我国,在临床应用中,疗效很好。另外,印度的“金篦角障术”,即用金鍼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在唐朝也得到广泛应用,可以使人恢复视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诗歌中,都提到这件事。在方药方面,《外台秘要》中还记录了许多印度的方剂和药物。从印度引进的方剂有“疗肺病咳嗽脓血及唾涕血不止方”、“牛膝三物散”、“久患风赤眼

方”、“疗脚气方”、“婆罗门僧疗大风疾方”等。<sup>[1] [P171-172]</sup>从印度引进的药物有金刚石、青木香、胡椒、沉香、天竺桂、苏合香、龙脑香、象牙等等。印度的药物多以植物、动物和矿物为主,而不同于阿拉伯的药物,多以香燥植物为主。

### (三) 数学领域

印度教的算法书籍很早就传入中国。在《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着《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等。印度教的运算方法,有许多内容比中国的先进,故促进了我国数学的发展。例如,瞿昙悉达所译的《九执历》,就把印度的数字码(即我们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和笔算方法介绍给中国人。在此书中,列举了0、1、2、3、4、5、6、7、8、9等十个数字符号后,指出“右天竺算法,用上件九个字乘除,其字皆一举札而成。凡数至十,进入前位。每空位处,恒安一点。有间咸记,无由辄错。运算便眼,述须先及。”<sup>[4] [P118]</sup>由此可见,古代印度人发明的“0”、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的运算方法,在唐代或更早的时代就已传入中国。

另外,中国自然科学史专家陈久金先生,在注解《九执历》时说《九执历》中的“月间量命,为求月距纬之用的数据,以月距交一象限分为二十四段,取各段之正弦线,通为弧度列成表。”<sup>[4] [P118]</sup>这句话说明,古代印度人在测量月距时已经会用三角函数表。印度的三角函数表,在唐代通过《九执历》也传到我国。

### (四) 哲学领域

印度教六派正统哲学的典籍很早就传入我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数论派哲学经典《数论颂》在南北朝时代被译成中文。《数论颂》问世于3~4世纪,是数论派的早期经典。6世纪,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大和尚陈真谛,把此书从梵文翻译成汉语,取名为《金七十论》。《金七十论》的学术价值很高,它是数论派有关“神我”和“自性”并列的二元论哲学体系的代表性著作。此书在我国一直保存完好,但是在印度却早已失传。到了现代,印度人为了研究数论派哲学,不得不将这部书又从中文倒译成梵文。

印度教另一个重要哲学派别——胜论派的思想,也在7世纪传入中国。唐代高僧玄奘,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把胜论派重要经典——《胜宗十句义论》由梵文译成中文,从而使胜论哲学系统完整地传播到我国。《胜宗十句义论》一书在印度早已失传,但是玄奘所译的中文译本在我国一直保存完好,故成为研究古代胜论思想的最宝贵的文献资料。

胜论哲学的主要学说,是“六句义说”(或“十句义说”)和“极微说”。所谓“句义”,用现代哲学术语说,就是“范畴”。胜论对世界上千变万化的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归纳,最终把这些现象概括为“六大范畴”或“十大范畴”。“六大范畴”包括“实体”、“性质”、“运动”、“普遍性”、“特殊性”和“内属”。“十大范畴”,则再加上四个:“可能”、“非可能”、“亦同亦异”和“非存在”。简言之,胜论主张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是世界的基础,承认运动是事物不可分割的属性,并对事物的各种形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归类。在探讨物质和物质运动时,胜论又提出了“极微说”,即“原子论”。它认为,世界是由不同性质的原子(极微)所构成的。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物质单位,事物是由原子的聚合而成,由原子的分散而消失。原子的最初形式,是两个原子成对的结合,称为“二重原子”。三个“二重原子”结合成“三重原子”,以此类推,多重原子的积聚,便形成世界的各种形态。因此,胜论是印度教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唯物论学说。

胜论思想传入我国后,对我国佛教和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胜论的唯物思想对佛教的唯心主义教义有较大的威胁和冲击力,所以一直受到我国佛教学者的批驳。隋代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大师,在建立三论宗思想体系时,为了破邪显正,在他的《百论疏》中就对胜论的各个学说逐一进行批判,他把胜论的“句义说”和“极微说”都视为“邪因邪果”。但是,另一方面,胜论的学说也受到我国一些具有唯物思想的哲学家的欢迎。如,唐代的唯物论哲学家吕才(600~655),在阐述他的无神论和唯物论思想时,就多次引用胜论的极微说,把胜论的原子与易传的气都看作是物质范畴,并以此作为世界的基础。他还把胜论的“多生一”(多重原子构成一物)与易传的“一生多”(元资一气,终生万物)相比较,认为“多生一”和“一生多”,两者虽说法不同,但本质是同一的。据史书记载“胜论立常极微。数乃无穷,体唯极小,后渐和合,生诸子微。数则倍减于常微,体又倍增于父母,迄乎终已,体遍大千,究其所穷,数唯一。吕公所引《易系辞》云,‘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与彼,言异义同。”<sup>[5] [P364]</sup>这段话是说:吕才认为,易辞的“一生多”和胜论的“多生一”,两者言异而义同。由此可见,胜论传入中国后,对我国唯物论哲学的发展是有深刻影响的。

在我国历代高僧翻译的大量佛教典籍中,有很多

都涉及到印度教哲学的内容。例如,涉及数论哲学的佛经有《佛所行赞》、《大庄严经》、《大智度论》、《百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涉及到胜论哲学的经典有《成实论》、《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俱舍论光记》等。这说明,印度教的数论和胜论哲学对我国佛教思想有广泛影响。

古代印度教的“因明学”(“五明”之一),即逻辑学,非常发达。正理论就是专门研究逻辑学的一个印度教哲学流派。佛教产生以后,佛教在继承印度教正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印度的因明学。早在南北朝时代,印度因明学著作(包括佛教和印度教的因明学著作)就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语。到了唐代,玄奘曾把印度新因明学大师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以及陈那弟子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是印度因明学的代表作,它们传到中国后,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另外,印度因明学在我国西藏地区的流传,甚至比汉地还要广泛。8~9世纪,大量的印度因明学著述被译成藏文。11世纪以后,西藏佛教学者在吸收和消化印度因明学的基础上,也创作出自己的因明学著作。例如,噶丹派学者菩提称所著的《量决定论广注》和《略注》,菩提称的弟子法狮子(1109~1169)所著的《量论摄义》;萨迦派学者萨班所著的《正理藏论》、其弟子乌由巴正理师子所著的《量释论正理藏》和《正理宝藏论大疏》;以及宗喀巴大师的弟子贾曹杰(1364~1432)所著的《集量论释》等,都对西藏因明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 (五) 宗教领域

印度教古代的许多梵文经典很早传入我国,并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摩诃婆罗多》、《薄伽梵歌》、《莲花往世书》等。这些梵文原典大都是11世纪以后的手抄本,对研究印度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伴随着佛教,印度教许多教义和思想也在我国得到广泛地传播,如“生死轮回”、“善恶报应”(即“业报”)、“三世因果”、“解脱”、“瑜伽”、“化身”等等学说。

印度教的许多神灵被印度佛教所吸纳并奉为护法神,这些神灵也随着佛教传入我国。现在,在我国的佛教庙宇中,供奉着许多印度教的神灵。例如,在佛教寺院大殿两侧供奉的“二十诸天”,即二十个天神,原本都是印度教的神灵,来源于古代印度教的神话故事,后经佛教吸纳,而转化为护持佛教的天神。它们的名称是:大梵天王、帝释尊天、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金刚密迹、摩醯首罗、散旨

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韦驮天神、坚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神、摩利之天、日宫天子、月宫天子、娑竭龙王、阎摩罗王。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护法大神——帝释尊天(梵文 *ṣakra - devānāti - Indra*),其实就是从古代印度教最有名的雷电之神——因陀罗(*Indra*)演变而来的。还有“阎摩罗王”(Yamarāja),原本是印度教神话中负责主管人死后灵魂的一位天神(天界之神),他在《梨俱吠陀》中就已经出现。后来,佛教也吸纳了这个天神,让他主管地狱。伴随着佛教,这位阎罗王传入我国,被中国老百姓普遍接受。但是,经过中国人的改造,“阎摩王”变成了地狱中最公正的审判者,那些在人间做了坏事的恶人,到了阴间都会得到他应有的审判和惩罚。另外,印度教的许多女神也传入中国,如萨拉斯瓦蒂女神,她的画像在我国的佛寺中经常可以看到,称之为“辩才天女”;杜尔迦女神和迦利女神,也被我国藏传佛教所吸纳,在北京的雍和宫里就有她们的画像或塑像,杜尔迦称之为“难近母”,迦利称志为“时母”。

印度佛教后期的密宗,在崇拜对象和修持仪式方面大量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内容,所以,印度教性力派的许多仪礼和修行方式也自然而然地传到我国。在这一方面,我国藏传佛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密宗在修行时所用的“曼荼罗”,就是从印度教性力派那里引进的。“曼荼罗”(Mandala),实际上就是密宗修行秘法、举行法事的场所(坛场)。按照他们的说法:在修行秘法时,为了防止魔众的侵扰,需要在修法之处,按照要求,制作坛场。一般的曼荼罗是划一个圆圈或建造一个土坛,上面绘相应的色彩图画,并依照特定的方位,布置瓶、灯、花、香等饰物,以此象征佛、菩萨和金刚都聚会在此,以保证达到预期的修行目的和效果。

其实,印度教对中国的道教也有一定影响。我国学者刘仲宇先生在研究了道教早期经典——《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上品妙经》或《度人经》)后,指出道教与古代婆罗门教曾有密切联系。他说(《度人经》)以大梵为主神,宇宙经历劫运的演化图景,元始天尊开劫度人,等等,都是直接来自婆罗门教,或是从中引申、讹变而成的。其中,“大梵隐语”之类对诸天的赞美之辞,译自婆罗门教经典,但经过了浓缩改写。”<sup>[6] P80</sup>刘仲宇先生的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度人经》产生于汉末三国时代,正处于道教建立自己信仰体系的过程中,此时佛教和印度教已传入中国,因此,道教僧人吸收印度教的一些学说

以充实自己的思想体系,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道教与印度教在宇宙观和创世说方面是非常相似的。道教的“道”和印度教的“梵”,皆为宇宙最高本体、万物的创造者,两者创造世界的过程都是一种“生化”或“显现”的过程(即把内在固有的东西显现出来),所以,有些道教经典就直接把“道”称之为“大梵”。如《空洞迷歌之章魔王灵篇》说“梵行诸天,迂回十方。无量大神,皆由我生。”<sup>[3]</sup>这表明,道教思想体系的形成,在某些方面曾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道教也曾影响过印度教。自从7世纪唐玄奘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以后,老子和道教的思想在印度得到广泛流传,自然在许多方面对印度教产生影响。印度学者发现,道教的修行术曾对印度教性力派产生过影响。道教主张“阴阳和合”而生世界,重视“内丹”和“外丹”的修炼;而印度教的性力派也主张,万物是“男女和合”而生,注重精神和身体的修炼。道教有“阴阳抱合”之术,性力派有“双身交合”之术。所以,据印度专家考证,在修行方法上,印度教性力派曾吸收道教的一些功法。例如,在印度孟加拉地区发现了一些印度教性力派经典,如《多罗母密义》、《楼陀罗合璧但多罗》和《摩诃支那功修法》等,在这些经典中都提到“左道”性力派的一些功法来自中国道教的功法,又称为“支那功”。<sup>[4] (P248)</sup>

#### (六) 瑜伽领域

印度教瑜伽术对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瑜伽原本是印度教徒为了实现解脱而进行的修行方式,它分为许多种,其思想和实践方法都非常复杂。大约在4世纪,印度教的瑜伽术就已传入我国,对我国佛教、道教、儒教、医学、武术和内功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佛教禅宗所修的“上乘禅”、天台宗提倡的“六妙法门”、净土宗主张的“念佛三昧”等修行法,皆可以明显地看出印度瑜伽的影响。我国古代的一些健身术也与印度的瑜伽有过交流。例如,南北朝时流行的“易筋经”、唐朝流行的“天竺按摩法”、宋代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都是从印度传进来的。据说,“易筋

经”就是少林寺的开山老祖达摩大师所传。《易筋经》中所练的功法,如内壮、外壮、动功、静功、炼形、炼气、炼意等,与印度教古典瑜伽提出的“八支行法”,即内修、外修、坐法(炼形)、调息(炼气)、禅定(炼意)等基本相似。另外,我国宋代所流行的“婆罗门导引法”(从印度传来的瑜伽功法),最早出现在宋代张君房所著的《云笈七签》中。“婆罗门导引法”包括十二种功法,如“蛇功”、“龟功”、“孔雀功”、“鹤功”、“莲花功”、“仙人功”等,这些功法的传入对我国武术和内功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除上述领域之外,印度教还在文学、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都对我国产生过影响,在此不一一赘述。

印度是中国的近邻,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频繁往来,相互学习,促进了双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尤其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从佛教和印度教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古代理想文化。在当今的世界上,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加强对印度教文化的研究,一则可以让国民了解印度,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交往的思想基础,二则也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优秀的东西,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大繁荣。

#### 参考文献:

- [1]耿引曾. 汉文南亚史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2] [唐]玄奘. 大唐西域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 [3]黄心川. 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J]. 宗教学研究, 1996 (3).
- [4]薛克翘. 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5]黄心川. 印度哲学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9.
- [6]刘仲宇. 度人经与婆罗门思想[A]. 黄心川. 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M]. 宗教学研究, 1996 (3).

[责任编辑: 卢晓昆]

( 11) **The Influence of Hinduism on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ZHU Ming-zhong • 57 •

**Abstract:** India and China are old civilizations which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the past two thousands years. After Hindu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ccompanied by Buddhism ,it influenced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on many fields such as astronomy ,mathematics ,medical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ur ancestor ever adopted some beneficial parts from the culture of Buddhism and Hinduism ,enriched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greatly.

**Key Words:** Hinduism; Buddhism; Brahman

( 12) **State Governa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thnic Problems in Northeast India** YANG Xiao-ping • 63 •

**Abstract:** India is a strongly diversified state in religions ,ethnics and languages. The handling of the ethnic problems in Northeast India by the federal highlighted not only the complexity of ethnic issues of India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s of national ethnic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stat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n the process from ethnic identity to citizenship identity ,state governance is the crucial medium for identity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ithin the democratic framework ,India has taken some specific state governance measures to solve the ethnic problem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actually provided meaningful references and illustrations for other nation-states. At the same time ,lessons on mishandling and governance inadequacy during the process should also be learned carefully.

**Key Words:** Northeast -India; Ethnic problems; State governance

( 13)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us NGOs in Indonesia Based on the Bodhicitta Mandala Foundation**

YANG Hong-yun • 69 •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NGOs have grown up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come the government's partners and important resources in improving governance. The Chinese NGOs' role is just as others ,but it is limited. However ,the Chinese religious NGOs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a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affairs for its religiou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ese religious NGOs' emergence is the Chinese caus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affairs during the Indonesian transformation period.

**Key Words:**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Religious NGOs

( 14) **A Review of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Northeast India**

LIN Yan-ming • 76 •

**Abstract:**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problems of Northeast India ,such as ethnic ,religious ,social , and historic problems ,since the 1970's and 1980's of the last century. Especially ,the ethnic problems are always a universal matter of concern.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types of those results ,this paper provides a primary review of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on Northeast India.

**Key Words:** Northeast India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 15) **Analysis on National Separationism through the Fog of History**

——Exploration and Initiative of Study on Ethnic Issues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Coexist and Ethnic separatist movement

CHENG Yi-fan • 82 •

**Abstract:** Ethnic Issue of Southeast Asi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alyses Indonesia Aceh's national separationism and raise the argument about "Economic-Culture dual structure" to explain national separation mo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When discuss on the ethnic issues of Indonesia Aceh ,Muslims in souther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 Moro people ,the book does not make judgement with sense of virtues and vices ,and prevent from the possible prejudice. The companion volume Multinational Coexist and Ethnic separatist movement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relations ,and try to explor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multinational coexist. With the clue of historical context ,the two books attempt to exposi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national problems in a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problem; Separationism; Coexist